

淄青镇在唐罗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李锐锐

贺州学院，广西贺州

DOI: 10.62836/ssr.v3n5.1509

摘要：淄青镇先后由侯希逸、李正己、李纳、李师古和李师道等担任节度使，历时将近57年。淄青镇在唐罗海上贸易中重要地位的形成与当时的东亚格局有关，也与唐朝政府的对外交往管理体制及相对开放的经贸交流政策有关，还与历任淄青镇节度使的管理有关。淄青镇海岸线较长，是唐罗海路交通中优良海港所在地。由登州出发至少有两条航线可到达新罗，便捷的海上交通为唐罗间的官方贸易和民间的私人贸易交往提供了方便。唐罗商业网是以淄青镇地区为中心向周围城镇扩展。淄青镇因其与新罗隔海相望的有利地理位置，是唐朝在北方的对外交流窗口和枢纽，一度成为唐罗海上交通要道。

关键词：淄青镇；海上贸易；经济交流；交通路线；藩镇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Ziqing Tow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illa

Ruirui Li

Hezhou University, Hezhou, Guangxi

Abstract: There were Xiyi Hou, Zhengji Li, Na Li, Shigu Li and Shidao Li who had successively served as governors in Ziqing Town in 57 years. Ziqing Tow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ang and the Silla's sea trade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pattern of East Asia at that time and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o the relatively ope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 polic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o the management of governors of Ziqing Town. There were some excellent ports in the long coastline of Ziqing Town. There were at least two routes from Dengzhou to Silla at Ziqing Town. The convenient maritime traffic had facilitated the official trade and private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ang and Silla. The commercial network of the Tang and the Silla was centered on and expanded to surrounding Ziqing Town. It became a window and a hub of foreign exchange in the north of the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its favorabl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cross the sea from Silla. Ziqing Town once became an important maritime traffic route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Silla.

Keywords: Ziqing town; sea trade; commercial exchange; traffic route; town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韩古代灾异比较研究”（项目编号：SC20B031）。
作者简介：李锐锐（1978-），贺州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是民族地区历史与文化。

1 问题的提出

玄宗即位之初，姚崇、宋璟相继入相。励精图治，政平民阜。故唐之治世，前推贞观、后称开元。自玄宗晚年以来，唐内乱叠，国威中替。突厥、吐蕃、回纥诸国，屡乘隙扰边。至是威弧复张，声教远被，失地尽复，乃置十节度（节度使始于永徽以后至景云二年遂以名官）、经略使。俾总军旅、颀诛杀，以备边。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余匹[1]。《旧唐书·职官志》载：

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符，树六纛。外任之重，无比焉。至德已后，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节度使之号[2]。

唐朝为保卫中心腹地的安全，在边地设置了10个节度使，形成拱卫两京的防线。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节度使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安禄山便利用这个权力反叛朝廷，从内部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导致华北地区军人武力的崛起[3]，形成独占势力范围。

平卢军于公元761年全军渡海南迁，进入了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在山东站稳脚后，唐朝政府任命侯希逸为青密节度使，同时设立淄沂节度，不久将淄沂节度裁并到青密方镇，任命侯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新唐书·藩镇魏博传》载：“淄青传五世而灭，有州十二。”[4]淄青镇先后由侯希逸、李正己、李纳、李师古和李师道等担任节度使，历时将近57年。淄青镇最初有淄州（治淄川今山东淄川）、青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海州（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莱州（治掖县今山东莱州）、沂州（治临沂今山东临沂）、密州（治诸城今山东诸城）、德州（治安德今山东德州）、棣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等10州，又占据曹州（治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郛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等5州，共拥有15州。在李纳时期失去德、棣、徐3州，至此淄青镇灭亡一直占据12州

的广阔土地，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山东省全境和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的各一部分，是唐朝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藩镇之一。

2 唐罗往来中的淄青镇

唐与新罗在朝贡册封体系下建成了古代国家体系并确立了社会统合理念，促进了优秀文化的传播和经济贸易的发展[5]。对于唐与新罗的经贸关系，史学家们一般认为可分为通过双方外交使节进行的官方贸易和民间的私人贸易两种。

进入7世纪末，罗唐紧张关系缓和下来，恢复了外交贸易文化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公元699年以后，新罗几乎年年遣使入唐，有时甚至一年两三次。到8世纪中期，两国政府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高潮[6]。新罗使臣携带着大量贡品献给唐朝皇帝，而唐朝皇帝会给这些使臣赏赐丰厚的恩赐品，让他们带回新罗。反之，唐朝的使者也会给新罗王带去许多礼物，新罗王当然也要回送。通过这种方式，唐罗间完成了一次官方贸易[7]。朝贡册封体制下的贡品和回赐，是伴随政治外交行为进行的经济贸易活动。

唐朝的邮驿制度盛极一时。当时的邮驿，分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三种。唐朝的驿站遍于天下，被人称作“驿馆”或“候馆”。著名诗人韩愈写道：“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可见驿站之多。驿站中不仅建有样式和规格不同的驿舍，而且还配备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如陆驿规定马每天走70里，驴50里，车30里。各级官员使用车马多少，也有一定的限制。当时的官邮线路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是30里一站，全国共有驿站1600多处[8]。从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到山东半岛的路线，基本是长安东行到华州（治郑县今陕西华县）、经潼关（今陕西渭南潼关县北）、到虢州（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再到东都（今河南洛阳），再经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入河南道，到汴州（治浚仪今河南开封）东行到曹州、兖州、淄州、青州、莱州，最后到达登州。还有另外一道，就是进入淄青镇所辖地界后从兖州到齐州、经

淄州再同前路合成一条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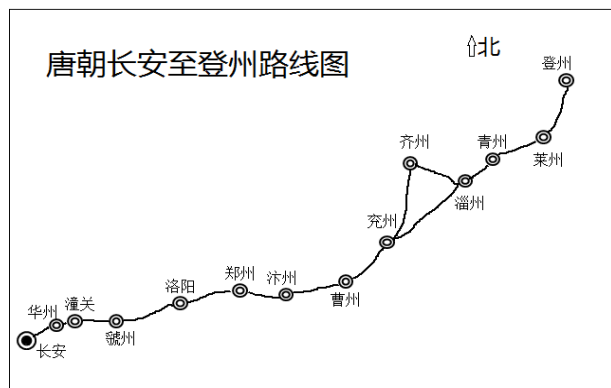


图1. 唐朝长安至登州路线图

如图1所示，从唐都长安至新罗途经淄青镇所辖的7个州，这些州是唐罗贸易交通中陆路必经之处。遣唐使团在登州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登州官员通报使臣到达的消息，官府在验明身份后，为使团做住宿安排，并通过驿站，快马急报京师长安。进京圣旨下达后，登州官方根据礼制规定，公布大使以下随从人员允许进京面圣的人选，然后颁发“关牒”文书，经莱州、青州、兖州、曹州、汴州、东都洛阳，到达京师长安。[9]为了接待频频而来的新罗留学生和使团，唐朝政府在新罗客人航海来华登陆港口——登州城南街，专门设立有“新罗馆”，用于安置新罗客人的食宿；另外，唐朝政府在登州至京城长安之间，还设置有系统的馆驿，中央有一名监察御史专管馆驿事务[10]。

唐与新罗进行官方贸易的同时，民间贸易也逐渐兴盛起来。遣唐使团到达唐境后，凭登州官员发放的关牒在华期间可以用来证明身份，享有通行证的作用，还可以享受交通、住宿免费的优惠待遇。不能随团进京的随行人员，多是船工、水手、护卫、杂役等较低人员，他们则必须留在登州守候，少则数月，多则一两年，这些留守人员有很多机会与登州百姓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活动[11]。与此同时，新罗商人纷纷来中国经商，在唐境他们主要集中在山东半岛和江淮地区的水线城镇，利用他们所经营的私驿、驴、马车队和船队之便，长途贩运，居间贸易[12]。东北亚的新罗船队多居间贸易，分别来往于唐和日本之间，大量新罗商人来唐贸易，贸易额最大，新罗船队活跃在黄

海、渤海之间和江淮、运河之上，独自形成了北起登州、莱州，东到海州（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涟水（今江苏淮安涟水），西到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南达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扬州（治江都今江苏扬州）、苏州（治吴县今江苏苏州）、明州（治鄞县今浙江宁波鄞江镇）的商业网络，新罗的船队和水手主要侨居在赤山镇（今山东荣成石岛镇附近）、楚州、涟水和扬州，经常为大唐或日本所雇佣。新罗人的商业网络以淄青镇地区为中心向周围城镇扩展。

淄青镇能够成为唐朝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不仅与其有利的地理条件有关，还与齐鲁地方的农业、手工业、制造业、特产及矿产资源有关。淄青镇所辖区域自汉代以来物产比较丰富，到唐代时期淄青镇州县纺织业、印染、刺绣、成品布匹及衣帽制造业都有所发展。此地盛产防风、牛黄等优质药材，并形成采种制售一条龙产业链；此地蕴藏着丰富的铁、铜等矿产资源，冶铁业、石器制作业发达；淄青镇有许多近海州县，水产和海盐资源丰富；此地生长有制造海船所需要的楸树，又为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为航海业的兴盛创造了条件。丰富的陆地和海洋资源促进手工业、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创造出大量质量上乘的产品，其中不仅有向朝廷进贡的贡品，还有大量可供市场买卖的商品。

同时，淄青镇地处战场边缘，地方经济、基础设施没有受到多少战争的破坏，这也是淄青地区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淄青镇因其便利的陆路与海路交通位置在唐罗交往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唐罗官方交往的中转站，更是民间交流的窗口。

3 淄青镇作为唐罗交通要道的形成原因

淄青镇之所以能够在唐罗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如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1 淄青镇特殊的地理位置

淄青镇海上贸易位置的凸显与当时东亚格局密切相关。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同时，在唐朝的东北

地区兴起渤海和契丹。唐王朝为了有效地牵制渤海的力量，需要与新罗交好以使渤海两面受敌；而新罗实现统一后，也需要恢复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友好关系，一方面大力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依靠与唐朝的盟好同渤海以及日本在政治上进行抗衡[13]。同时，新罗和渤海之间长期处于持续的竞争与对立状态，直接导致辽东地区不再是唐罗经济文化交流的安全通路和媒介。新罗作为朝鲜半岛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唐罗之间的外交体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唐罗间通过海路交通进行直接而活跃的经济文化交流[14]。这是淄青镇之所以能够成为唐罗海上交通要道的条件之一。

淄青镇海岸线较长，是唐朝与新罗海路交通中优良海港所在地。《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贞元年间宰相贾耽记叙的内容：

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15]。

如上所述，在唐朝对外交通最重要的七条道路中，海行路线有两条，其一是北方的从登州出发可

到达高丽（朝鲜半岛）和渤海的路线，其二是南方的从广州（治南海今广东广州）出发到南洋及更远国家的路线。

对于淄青镇在唐朝通往东北亚交通的地位，《元和郡县图志》载：“（登州）当中国往新罗渤海过大路……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大人故城）。[16]”由此可知，登州及其沿海一带是渤海人和朝鲜半岛人由海陆往返唐朝的必经之途。《唐六典》载：“（河南道）远夷则控海东新罗、日本之贡献焉。[17]”河南道所辖区域中属淄青镇海岸线最长，因此可以将此处河南道理解成由淄青镇负责管理和接待新罗、日本使臣入唐朝贡的相关事宜。

唐罗贸易往来的海路交通线分为官方路线和民间路线等两种。

有关官方路线，中日韩学者们基本认同《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

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墻，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墻，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18]。

如图2所示，这条沿岸航路，航程较长，但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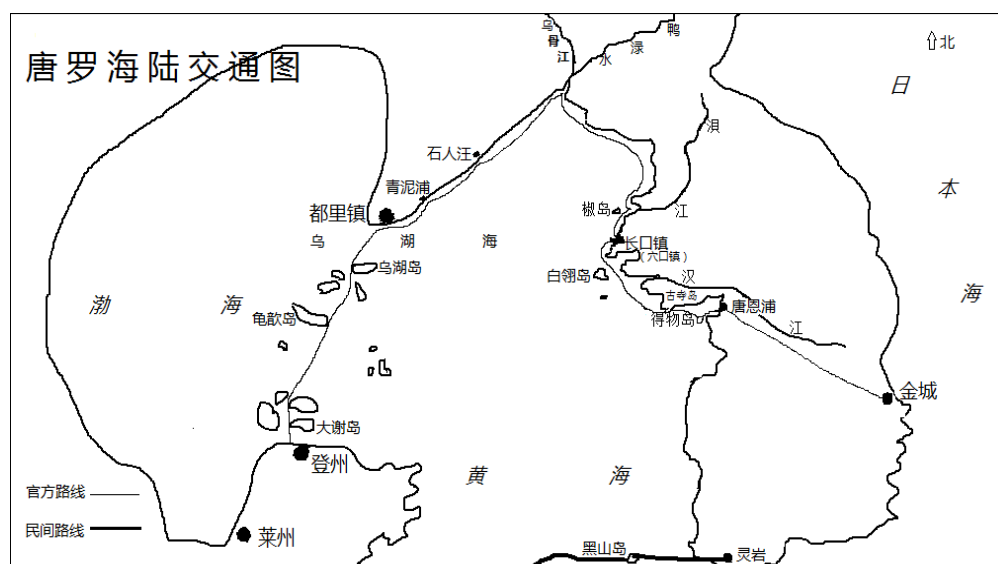


图2. 唐罗海陆交通图

险小、较为安全，是唐朝与统一新罗之间官方认可和保护的主要航路。

有关唐罗民间航海路线存在颇多争议。中外学者基本认同的民间航线是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的记述：

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新罗）[19]。

由登州入海路线是当时从唐朝北方港口出发到达新罗最便捷、距离最短的路线，如果赶上顺风只需要两三天就可以到达新罗地界。

王小甫先生认为，唐与新罗的贸易大都是通过海运进行，海上交通其实远不止登州一道。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指出唐与新罗的海上信道共有五条[20]。即，唐罗间除登州道官方路线外，还有五条民间路线。朴真奭等先生认为唐罗海上交通路线除了登州道外，还包括西南海岸灵岩郡出发，经黑山岛横渡黄海到达长江口附近[21]，共官民两条路线。由各家之言中可以推断由登州出发至少有两条航线可到达新罗，如此便捷的海上交通为唐罗间交往提供了方便。

3.2 唐朝政府的对外政策

由于唐朝创造了高度繁荣的经济文化，成为当时世界上头等东方强国，对周边民族和国家散发着强烈的吸引力。日本学者堀敏一认为，中国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册封，而是包含从羁縻州到单纯的朝贡等多种形式，它们随着中国与各民族之间的实力关系而呈现多种形态，并因此而缔结比较宽松的关系[22]。这是唐朝与周边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繁荣的原因之一。

唐朝政府有一套系统管理掌握对外交往的机构及相应的政策。唐朝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来唐外国人。《唐六典》载：

1.主客郎中、员外郎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其朝贡之仪，享燕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23]。

2.鸿胪寺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务；少卿为之

贰。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二王之后及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以上尚书。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24]。

3.蕃客在馆设食料五等。蕃客设食料，蕃客设会料，各有等差焉[25]。

唐朝政府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外国来使的朝见礼仪、住宿接待等事务。

《新唐书·百官志》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朝集日，视品给以衣冠、袴褶。……供客食料，以四时输鸿胪，季终句会之。客初至及辞设会，第一等视三品，第二等视四品，第三等视五品，蕃望非高者，视散官而减半，参日设食。路由大海者，给祈羊豕皆一。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诸蕃，则给度碛程粮。蕃客请宿卫者，奏状貌年齿。突厥使置市坊，有贸易，录奏，为质其轻重，太府丞一人涖之。蕃王首领死，子孙袭初授官，兄弟子降一品，兄弟子代摄者，嫡年十五还以政。使绝域者还，上闻见及风俗之宜、供馈赠贐之数[26]。

外国人入朝、归国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途经各州县的官员负责发放通关边牒。入朝时，政府按蕃官官职高低分别给予相应的衣冠、食物、备品等。其中有相当人性化的政策，尊重各蕃国迥异的风俗习惯，给予归国途中祭祀所需物品及回程粮食等。

唐朝设有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诸互市监一职，有监、丞各一人，监从六品下，丞正八品下。“各掌诸蕃交易之事”，“凡互市所得马、驼、驴、牛等，各别其色，具齿岁肤第，以言于所隶州府”[27]，唐朝诸互市监主要掌管与西北诸族及诸蕃国之间的贸易。

根据唐朝政府的规定，外贸活动中“凡官私互市，物数有制。[28]”唐王朝采取了很多保护外商的措施，包括限定关税、市场公平交易、外商死亡的遗产处理等等，都有明确的保护性规定[29]。针对滞留在唐的外国人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诸外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

法律论。[30]”外化人即诸蕃夷之国人，各自有不同的律法习俗，如果同一国家的人之间发生纠纷就依据各国法规处置，如果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发生纠纷就按照唐朝法律处置。

唐朝为了尊重外国人生活风俗和从事商业的便利，专门设置了供外国人居住的藩坊。藩坊设置与唐朝本国居民居住区村坊设置相类似，在《旧唐书》中记载：

1.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31]。

2.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32]。

即在两京、州县等城内的居民聚居区称为坊，而位于城外、郊区或乡村的居民聚居区等则称为村。由此推知，新罗坊或新罗村应是唐朝政府为安顿来唐经商、居住的新罗人而设置的机构。但是新罗坊又与唐代一般城市里的坊市有区别，专门指供外国人（新罗人）居住的区域。关于新罗坊形成时间朴文一先生认为新罗坊最初形成在7世纪50年代前后，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陈尚胜先生认为淄青镇节度使李正己及其继任者作为高句丽后裔仍对新罗人持有敌意和歧视，这是新罗奴婢掠卖盛行一时的因素之一。9世纪20年代唐朝政府放还新罗奴婢与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先生认为，唐朝后期的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莱州（治掖县，今山东莱州）、密州（治诸城今山东诸城）、青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淄州（治淄川今山东淄川）、泗州（治临淮今江苏盱眙）、海州（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扬州（治江都今江苏扬州）以及长安等地，都有不少新罗侨民居留。在这些地方，还分别存在有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新罗馆、勾当新罗押衙所等组织或机构[33]。陈先生对这些机构的功能、设置的目的、管辖范围等进行考证，认为只有新罗村和新罗坊是新罗侨民的居住区域。姜清波先生认为新罗社区的形成与新罗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将新罗奴分为两种，一种是9世纪

初新罗发生饥荒有一部分新罗人被掠卖入唐，一种是新罗向唐朝进贡的奴婢，而前者在入唐新罗人中占多数。

唐朝政府为了加强与东亚诸国联络，任命淄青节度使兼任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一职。实际上担负着沟通新罗、渤海和唐朝廷的职责：负责接待使者，向朝廷汇报情况，并传达朝廷的态度。从淄青上岸的新罗、渤海人受到设于登州的新罗馆和渤海馆的接待[34]。其实，新罗馆只是唐朝政府专门用于接待新罗朝贡使团的宾馆，并不对普通新罗商人开放，也与新罗侨民无关。登州城内专设新罗馆和渤海馆，是由于唐朝规定登州是新罗和渤海两国朝贡使团的入境港口[35]。唐朝在中央设置有“馆驿巡官”，在地方州县则以县尉或主簿专知驿馆事务[36]，可推测新罗馆是唐朝驿运系统的一环。淄青镇能在唐罗经贸交往中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并非历史的偶然，它是以上诸多因素共同成就的。

3.3 历任淄青镇节度使的统治策略

淄青镇所辖地区比较富庶，地方建设基础相对强大一些，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自唐以上，财赋所自出，皆取之豫、兖、冀、雍，未当求足于江淮也。[37]”富庶的地方经济为淄青镇节度使推行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支援。淄青镇的几任节度使比较注重农业生产，如侯希逸的“理兵务农”，李师古力劝李师道要“知稼穡之艰”，这样既可安抚民心又可休养生息，为淄青镇的长期割据积蓄力量。特别是在李正己统治时期，他“为政严酷，所在不敢偶语”“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最称强大。[38]”李正己时所统有淄、青、齐（治历城今山东济南）、海、登、莱、沂（治临沂今山东临沂）、密、德（治安德今山东德州）、棣（治厌次今山东惠民）、曹（治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濮（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徐（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兖（治瑕丘今山东兖州）、郛（治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15州，皆富庶地带，因而有可能做到“赋均而轻”，其他地狭兵众之处未必能如此[39]，这些为淄青镇的对外贸易提供了稳定的社

会局面和安定市场环境。严酷统治政策加上发达的地方经济,使淄青镇成为诸藩镇中社会秩序井然、经济贸易活动活跃的地区。

4 结语

由侯希逸始建历经李氏家族几代统治的平卢淄青镇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平卢淄青节度使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周围藩镇甚至朝廷抗衡,对海外商人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正如拜根兴先生所说,新罗商队的到来会给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相当可观的利益,而新罗侨民的定居又增加了地方上的劳动力[40]。这些都有利于李氏家族加强割据实力、增强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砝码。淄青镇不仅是唐朝诸藩镇中统辖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割据政权,还是唐朝在北方的对外交流窗口和枢纽,因其与新罗隔海相望的有利地理位置,一度成为唐朝与新罗海上交通要道。

参考文献

- [1] (日) 桑原陟藏,山阴金.东洋史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99-100.
- [2] 旧唐书[M].卷44.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06:1922.
- [3] 李鸿宾.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C].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74.
- [4] 新唐书[M].卷210.藩镇魏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5923.
- [5] (韩) 金翰奎.中韩关系 I [M].首尔:아르케,1999:31.
- [6] 朴真奭,姜孟山,朴文一,金光洙,高敬洙.朝鲜简史[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92.
- [7] (韩) 金翰奎.中韩关系 I [M].首尔:아르케,1999:319.
- [8] 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87.
- [9] 李焕.登州遗韵[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45.
- [10] 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97:19.
- [11] 李焕.登州遗韵[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45.
- [12] 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J].中国史研究,1993(03):148.
- [13] 王小甫.唐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C].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330-331.
- [14] (韩) 金翰奎.中韩关系 I [M].首尔:아르케,1999:318.
- [15] 新唐书[M].卷43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1146.
- [16]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卷11.河南道七.登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311、313.
- [17] 李林甫.唐六典[M].卷3《尚书户部》,河南道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66.
- [18] 新唐书[M].卷43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1147.
- [19] (日)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6.
- [20] 王小甫.唐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C].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332.
- [21] 朴真奭,姜孟山,朴文一,金光洙,高敬洙.朝鲜简史[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92.
- [22] (日) 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M].韩昇、刘建英编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11.
- [23] 李林甫.唐六典[M].卷4.尚书礼部.“主客郎中”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129-130.
- [24] 李林甫.唐六典[M].卷18.大理寺鸿胪寺.鸿胪寺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505.
- [25] 李林甫.唐六典[M].卷4.尚书礼部.膳部郎中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129.
- [26] 新唐书[M].卷51.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1195-1196.
- [27] 李林甫.唐六典[M].卷22.少府监.诸互市监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415.
- [28] 旧唐书[M].卷43.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1828.
- [29] 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97:21.
- [30] 唐律疏议[M].卷6.名例律.北京:中华书局,1983:133.
- [31] 旧唐书[M].卷43.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1825.
- [32] 旧唐书[M].卷48.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2089.
- [33] 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J].历史研究.1996(01):161.
- [34] 姜清.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J].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01):91.
- [35] 陈尚胜.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J].东岳论丛.2001(06):106.
- [36] 陈尚胜.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J].东岳论丛.2001(06):106.
- [37] 王夫之.读通鉴论[M].卷23.肃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789.

[38]旧唐书[M].卷124.李正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3535.

[39]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5.

[40]拜根兴.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关联问题研究的现状

[C].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265-266.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Global Science Publishing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